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

李海涛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最初是以武士的行动为基点, 逐步发展成武士群体的一种行为习惯, 并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 这种行为习惯进一步内化为观念和精神。今天, 即使武士道的行为基础和精神基础都已不存在了, 但它作为日本所独有的文化仍深深影响着每一个日本人。

关键词: 日本; 武士; 武士道; 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08)01-0048-04

1899年,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 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他说: “武士道, 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 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 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唯其不言不文, 通过实际行动, 才能看到更加强有力的功效。它既不是某一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 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 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1](P15)}很显然, 他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武士道, 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化的武士道。如果从广义上讲, 武士道是指伴随着武士的出现而产生的武士所特有的行动行为和精神行为。在日本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 日本武士及其武士精神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2]在某种意义上说, 武士的行动行为和精神行为已内化在日本人的头脑之中, 指导着日本人的生活。

纵观日本武士道它大体经过了行动的武士道, 观念的武士道, 精神的武士道这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行动的武士道

公元八、九世纪, 伴随着日本土地制度的变迁, 日本武士开始出现并慢慢走上了历史舞台, 武家文化也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段时期, 日本大化革新所实行的土地国有制(“班田制”^[1])开始瓦解, 贵族、官僚、豪强和神社、寺院竞相垦田, 建立并扩大庄园。到了10世纪初, 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土地所有者, 特别是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 已不能有效地保证其土地免遭侵害, 同时, 也为了取得“不输”和“不入”的权力, 中小土地所有者纷纷将土地“寄进”给中央或地方权贵。他们每年向其缴纳一定数额的年贡, 并以其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 自己作为庄园的实际所有者, 担任庄官, 直接经营管理土地。这些接受寄进的权贵称为“领家”。如果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时, 就向更有权势的大贵族敬献年贡, 奉他们为更高一级领主——“本家”。这样, 土地越发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 庄园所有者中间便形成庄官——领家——本家等若干等级, 层层瓜分年贡。与土地资源的争夺相伴随, 中央集权体制和天皇大权旁落, 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形态——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先后粉墨登场。^[3]它们既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产物, 反过来又使各种矛盾斗争更加尖锐激烈, 而此时国家

收稿日期: 2007-10-01

作者简介: 李海涛(1982-), 男, 吉林公主岭人,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研究方向为中日韩哲学比较。

^①班田制是公地公民制, 即将氏姓贵族的私地和私民收归国有, 成为公地公民。政府将公地定期(每六年一次)班给公民, 称口分田。分得口分田的公民则负担租、庸、调。

48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又丧失了解决矛盾的权威和力量,于是,冲突各方便诉诸武力。这就为武力的具体行动者武士提供了存在的现实基础。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围绕着庄园的扩大和发展,与庄园命运攸关的土地矛盾日渐激化。为了在土地争夺中取胜,土地所有者(后称主人)便挑选身强体壮之人,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武士。武士通过在战争中勇猛杀敌,捍卫所在庄园的利益,来博取主人的赏识。主人根据武士的表现把从战斗中扩大的土地的一部分分给有功的武士。在当时有了土地也就意味着有了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因此,武士通过在战斗中凸现自身价值来换取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利益。武士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不会去追问战斗正义性,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主人也为了使自己的庄园扩大,利益扩大,需要武士。两者一拍即合,便形成了当时日本社会特殊的以功利为目的的主从关系。

首先,武士的行动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主从关系的缔结完全以私人利益为基础。主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庄园,掠夺更多的土地,需要武士;武士同样地也只是为了得到恩赏,才会在战争中勇猛献身,没有恩赏也就没有了武士的英勇杀敌。两者完全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缔结的功利性的主从关系。主从关系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彼此的利益,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抽象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其次,武士的行为活动具有非规范性。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武士多由庄民充当,具有兵民双重身份,不是专职武士。无战事时,他们就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耕作。一旦发生战事,他们就手举利器,奔赴战场,为主人勇猛杀敌。另一方面,当时武士的行动还仅仅是以庄园为单位的群体行动。在各自的庄园内,武士各为其主,英勇杀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活动。武士当时的行动还局限在各自的庄园内,还很零散,不具有大范围的整体性,也没有形成规范性的行为习惯。最后,在行为方式上,武士以三尺刀锋为谋生手段,依靠驰骋沙场为主人杀伐征战获取利益。其价值体现与战争息息相关。这种独特的生存条件养成了武士对武术、忠诚、名声的特别关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武士道还只是一种

雏形,武士的行为还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功利的、非规范的个人和小群体行动层次。

二、观念的武士道

“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主要应归因于其以武力和团结力组成了家族式的军事集团——武士团。维护家族的存在和发展是武士结成武士团的初衷,而维系主从关系则是武士团得以存在的前提。”^[4]随着武士和武士团这种私人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朝廷开始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并借助武士团的力量来平定地方叛乱,用武士来维护社会秩序。在平叛中,建立功勋的源氏武士团与平氏武士团的势力大增,并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然而,参与政权的平氏武士团骄横腐化,走上了贵族化的道路。这使他失去了政权基础。1180年8月,被流放的源赖朝在一片反平氏的声浪中举兵消灭了平氏。但源赖朝并没有重蹈覆辙,入驻京都朝廷,而是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1180年他在镰仓设立“侍所”,统一了各自为政的武士团,并将他们变为服从自己指挥的家臣(御家人)。源氏通过自设的政所、问注所、侍所来保持全日本的政治、司法、军事大权,并于1192年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这样,在御家人制度^①下,分散的武士团及其武士就都集中于幕府统治之下,武士的行动也走上了公共化、规范化的道路。

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使得依存于主从关系的武士的具体的、实践的战斗行为,缺乏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因此,主从关系需要一种主从道德来加以规范。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讲:“当武士阶级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以及伴之而来的重大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尤其因为他们经常处于交战者的地位,而且隶属于不同的氏族,这就更加有其必要了。”^{[1](P16)}所以,武士团不断制定出一些“家规”、“家法”等家训来管教武士,例如:《贞永式目》、《畷田信玄家法》、《长宗我部元亲百条》等。并通过这些家训使“武士道”从具体的行为活动发展成为一种观念化的道德规范。武士的能征善

^① 御家人制度是指幕府承认御家人对领地的所有权,或使之充任庄官而给予收入权;而御家人则承认为将军的从属,负有侍奉将军和从军的义务。御家人(武士)对将军要“忠”,将军对御家人要“信”。

战、英勇杀敌、对主君的忠诚、自身名誉已不是个人意愿的个体行动，而是家训中要求作为一名武士必须具备的、遵守的集体道德规范。

第一、以武勇为本。武士崇尚武勇，以武勇为价值实现形式，这是武士现实生活的需要。主从结合的直接动因是武力，换取主人恩赏的基本手段还是武力。武士所做的就是杀人或被杀的职业，在这种行为方式中，武勇不仅是武士的谋生技能和晋升阶梯，也是保全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族的兴衰荣辱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每个武士具有精湛的武艺和过人的胆气。幕府统治之前，这只是每个武士在战争中所表现的个体行动。而在镰仓幕府以后武勇已成为整个武士团所共同追求的价值体现。武勇既是武士个体的行为活动，又是武士团体所规范的行为。使武士的行为有了一种外在的观念上的约束。武勇也就成为武士重要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第二、忠诚至上。其一，武士的忠是在主与从的个人利益关系上建立起来的，是主从意识的核心。主从关系的具体性，决定了忠观念的特殊性。主君给家臣以封地和功名，武士为主君不惜牺牲生命，即对直接蒙受恩惠的主君忠诚。其二，战场上，主从生死相依，性命与共，主君处处依靠他的臣下，所以爱抚至深，而臣下也感谢主君的义气，不惜奉献生命。这使主从关系超出了简单的利益关系而带有明显的情感因素。为了报答主君的恩情，“不惜生命，竭力杀敌，攻入敌阵，马革裹尸，此乃幸事也”（《畷久军物语》）^[5]。武士把为报答主君家累代情谊而战死，看成是幸事，这充分说明了武士对主君的“忠”已不仅是一种被动的献身，而是能动的服务与表现。“有忠无私”正是这种献身道德的升华，当“忠”本身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时，为主君献身也就成为了一种绝对义务，从而成为规范武士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4]武士忠于主君，为主君不惜牺牲生命诚然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伦理，但这种伦理却不能从超越了武士个体所处情境，即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加以考虑，也不能就道德伦理本身来加以理解。

第三、重名轻死。武士“生于弓马之家，惜名不惜死”（《太平记》）。武士将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因为在名和命之间，

命是一时的，名才是万古的。武士不仅要爱惜自己的名誉，还要光宗耀祖。因此，武士的一举一动，不是受惜名的心情所控制，而是受求名的冲动所鼓动。武家社会刺激武士追求忠诚、武勇、甘为主君献身的名誉，武士则需要以忠诚、服从、报恩、知耻等名誉，来达到保全家庭和子孙昌盛的人生目的。正是这种重名轻死的行为取向，使武士之间开始出现美化死的倾向，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的忠诚或对自己荣誉的珍惜。

这一时期，武士道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武士道”这一词汇也还未出现。它只是以武士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观念化的武士道，还没有脱离武士的具体行动基础——战争。

三、精神的武士道

从武士的出现到德川时代，武士始终是以“战斗”置身于日本历史的中心。战斗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武器。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然而到了德川时代实质性的战争消失了。日本社会实现了长期和平稳定，加上“兵农分离”和“四民等级制”政策的实施，使武士不仅脱离了战争生活，也离开了农村领地搬进城市，过上了寄生生活，很多武士也由战士转变成了行政官僚。对武士来说，仅凭以往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无法应对现实社会的变化。这就需要武士用观念性的思想来认识自我，在精神上自我肯定。德川时代以前武士道是“作为战斗者规定自我的”，而在德川时代武士道则是提倡“非战斗者的观念道德至上主义的实践道德”，并且只是武士才特别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一般的农、工、商阶层的庶民，没有多大关系。这就使传统的以武士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武士之道向理论化、精神化的武士道过渡。而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著名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山鹿素行等人。其中尤以山鹿素行贡献最大。他把儒家思想与武士行为相结合，将过去武士经验主义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武士道。总的来说，德川时期的武士道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武士道的精神化。以前，战斗的武士是社会组织的中心，战争是武士的实践基础。而到了德川时代，太平盛世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使

从镰仓时期起一直以临战的心态生存的武士的存在基础发生了动摇。但日本人没有选择取消武士阶级的道路。这样,德川时代的武士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存在之所——战斗,开始用“观念性的思想认识自我”,从精神上自觉“死”。用观念性的思想认识自我,正如大道寺友山在他的《武道初心集》中说到的:“和平时代的武士应该时刻准备着一旦有事,就要大显身手。不然者,即使战争发生也只能成为一个凄惨的死狗”。这就是说所谓和平时代的武士是把“反复的日常事物”和“特别发生的战事”联系在一起生活的人。不要忘记战争,要时刻想像着战斗而生活。但现实上确实没有战争,所以武士只能在精神上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虽然,总在心中模拟着现实中没有的战争而生活不是容易的。问题是日本的武士努力这样做的并不在少数,这是日本人至今仍在骄傲的地方。从精神上自觉“死”是把“死”看成是实践武士之道途中所遇到的灾难,要顺天安命。武士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意识下,就应认识到每一刻的生存都是宝贵的,必须按着道义的标准而生,去实现自己的职分即人伦之道。武士应该把生命中的每一天看作是最后一天,即觉悟到“只有一日的生命”。正因为有这样的觉悟,武士总想着“我也许今天死”,那么我就得把今天该干的事情干完,不能拖到明天。明天也许不会有,所以,今天能干的事情我就要拿出全部的努力干完,我要尽我今天最大的努力认真对待主君和家属。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常把死放在心上”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第二、武士道的自觉性和理论化。山鹿素行在其《士道》篇中,强调武士应“知己之职分”——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而交接,此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无暇,不得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必须具备文武之德知也。”^[6]“素行的士道论强调职分的自觉和道义的人格”,并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固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

“卓尔独立”之心。武士要以“忠”为第一要义,身体力行人伦之道,并成为农工商三民的楷模,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成为超越身份等级界限的、全社会的最高道德和行为准则。^[7]这样,素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上确定了武士的存在理由和价值。

第三、武士道的平民化。德川时代,武士被置于四民之首,其行为方式、人生哲学自然成为农工商三民所崇敬和学习的对象。“在民众的主体性活动、通俗文艺形式和教育普及等因素的作用下,武士道逐渐为平民所接受,成为全民的道德和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8]正如日本民谣唱道的:“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新渡户稻造也说到:“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11] (P91)}更进一步说,武士道精神的平民化、普及化强化了日本人的一体意识和同质性,以至于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体。

总的来说,用儒家思想解释和重新建构的士道论既为幕藩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伦理原则,又为大多已行政官僚化的武士提供了合理而系统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武士道脱离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变成了形而上的精神化的东西。

四、余论

德川时代末期,由于幕藩统治腐败,国内各基层矛盾不断激化,再加上西方列强的船舰利炮,德川武家政权在一阵阵反对声中被推翻了。这使得武士道在现实社会中所依存的精神基础也不存在了,作为一名武士也无法从观念上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如果从文化的“硬性”角度来看,武士道已经消亡了;但如果从文化的“软性”角度来看,武士道的文化因子已经扩散到整个日本民族当中了。如近代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成为了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而进入现代又与日本经济腾飞相结合,成为民族奋进的底蕴和无穷的精神动力。

总的来说,各种文化首先都源于生活,并在生活中积淀下来,武士道文化同样如此。最初,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点都是个体的生活行动,当这种生活行动普遍化,固定化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在很多人都具有这种行为习惯时,(下转88页)

Children's Narrative vs Reflections upon the Realities

—A Psychological Probe into Children's Narrative Theory since the 1980s

Wang Wenling

(Literary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Province 1300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80s children's narrative works have embodied their root-searching function with their realistic responsibility, which can be called psychological probe. This trend shows these writers' reflections upon history as well as their humane care. Meanwhile, feminist writing as a peculiar discourse also expresses the anxiety of self-existence.

Key words: children's narrative, the 1980s, psychological probe, root-searching function, feminist writing

(上接51页)

个体的行为活动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规范、一种道德。一旦这种规范、这种道德成为行为判断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时,它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硬性”文化。反过来,这种“硬性”文化会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个体的行为。即使文化的基础消失了,它也会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动之中,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威力大概不会从人间消亡。它的武勇的以及文德的教诲作为体系也许会毁灭,但是它的光辉与阴暗,将会越过这些废墟而长存于世。

参考文献:

[1][日]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M]. 张俊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P15.

[2]李群. 武士道与文化侵略——探析近松门左卫门文学中的侵华意识[J]. 东疆学刊, 2005(4).

[3]杨绍先, 姜贵书. 武士道德雏形——平安主从道德[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4]王志. 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5][日]古田光. 日本思想读本[M]. 东京: 雄山阁, 1977, P37.

[6][日]相良亨. 武士的思想[M]. 东京: ぺりかん社, 1984, P5.

[7]姜贵书. 武士道嬗变的历史轨迹[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

[8]向卿. 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J]. 日本学刊, 2004(5).

[责任编辑 张克军]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Japan's Bushido

Li Hait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Province 133002,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Japan, bushido is initially based on the behavior of the samurai, and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kind of behavioral habit of the samurai stratum. After the samurai becomes a ruling class, the behavioral habit evolves into a kind of conception and spirit. Although the behavioral and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bushido does not exist nowadays, it still exerts a profound effect on every Japanese by its uniqueness.

Key words: Japan, samurai, bushido, culture